

宋大川 主编

# 北京考古史

夏商西周卷

张智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宋大川 主编

# 北京考古史

夏商西周卷

张智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序

记忆的历史,有着不同的“版本”,比如神话传说,比如民俗,比如历史文献,比如考古学遗存,等等。它们都记忆着历史,它们是历史记忆的不同“版本”。宋大川先生主编的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不仅是北京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考古学遗存所认识的北京史。例如其中《史前卷》中的《附表》,即《北京史前考古大事年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这就是北京的考古学史。因此,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考古学遗存所认识,或所表述的北京史,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即北京的考古学史,便是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所涵盖的内容。这也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这两史各自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就一个人来说,也因时、因视角、因视点而异。我在此时此刻所要说的则是:

从北京的考古学史来看,我认为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一靠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二靠考古学的实践,三靠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没有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不会有考古学。没有考古学,哪来的考古学实践?没有考古学实践,哪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所以考古学要存在,要发展,就得做好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

同时,应指出的是,考古学史既有横向延展的历史,又有纵向发展的历史。移用现有的或他人、异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进行遗存的研究,即使有新发现,产生了历史的新认识,也只能称之为考古学的发现史。如果考古学仅停滞于这一层面,那么,它展现的历史,便只能算是考古学发现史,即考古学史中横向延展的历史。只有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考古学才能既出现横向的延展,又呈现纵向的发展。既有横向延展、又呈纵向发展的考古学史,才是全面的考古学发展史。这样的考古学发展史,应是中国考古学人的追求。当然,我希望北京的考古学人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更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实践,虽是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更新的前提,但要实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创新,则需勤于在考古学实践中增加一个“悟”字,这也是我对北京考古人的一点希望。

至于文物保护与考古学发展应当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个人历来主张应该是良性互动和推进考古学的持续发展。我们应知,只有持续的文物,才能有持续的考古学发展。因此,这两个持续当是我们的追求。从这十卷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所认识的北京史

来看,一是我看到了北京考古学的成就,二是从当前文化建设来考虑,北京史本身确实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两三卷,也不是四五卷,而是长达十卷本的北京史。这篇幅巨大的北京史,体现了北京考古学成就的巨大。

这体现了北京考古学人巨大成就的北京史,引起了我们哪些思考?

一是要理解北京史,就得明白北京所处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环境。北京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当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面向欧亚大陆的中国西半部和面向海洋的中国东半部的连接地带。这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两类地理环境的位置。

二是北京是猿人演进为现代人的地区,很可能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转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地区。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暂无人涉及。因此,暂难言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族群文化的文化品性,存在如下应注意的文化现象:

其一,从新石器时代起,可以认为北京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或任何一种族群文化,就其文化构成来看,都是以一元为主的多元谱系的文化结构,即杂种文化。这种杂种文化乃是不同谱系的文化杂交产生的。所以出现文化杂交,乃是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

其二,北京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和争夺的地带。有时,北京存在多种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文化割据并存的局势。有时,北京局部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文化的更替。有时,整个北京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更迭。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延续时间之短,和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同一族群文化更迭频率之快,乃是北京文化演进的一个特点。

其三,西周封燕,是北京历史上出现的大事。所以是大事,一是开始将北京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二是出现了政权和文化的新关系。西周早期,周王朝(或燕国)政治版图或政权统治所及,仅限于北京部分地区。在这部分地区内,文化则是多元的。到西周中期,燕国政治统治涵盖了整个北京。此种现象,相对于此前的文化“一本多元”来说,我们称之为“一统多元”,即政权一统,文化多元。直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了政权与文化的“一统一元”,即政权统一,文化一元。自此以后,这种“一统一元”和“一统多元”的更替,一直延续到现代,这是北京政治与文化的一个特点。同时,需指出的是,“一统多元”下不同文化或族群的居民,既存在聚居,又存在杂居的现象,就聚居和杂居关系而言,又存在大聚居、小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和聚居、杂居难分秋色等不同情形。这是北京“一统多元”政治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我们论北京史者必须纳入眼帘的。

三是北京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步伐,大致同全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步伐一致,即经历了中国的北京、亚洲的北京和世界的北京三大时期。所谓世界的北京,说的是北京自明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使北京成为了世界的北京。除少数年代外,因为北京是这个时期中国的首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故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时的北京处于漩涡中心,走过的道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迂回曲折。现在该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了,该冷静下来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我以往讲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八个字。所谓“传承”,是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吸收”,是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融合”,是将这两种优秀文化融合起来,如“中体西用”、“中西之间”和“西体中用”等等;所谓“创新”,就是在“融合”的基础之上,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创造出新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乃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这是被恩格斯所肯定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在史前社会中就已存在,并呼唤在“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以“更高级形式”复活这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其实对中国来说,这种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也不是什么舶来品,这种文化已经以初级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古代的氏族制度中,不过在我国由氏族制度社会发展为文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民本思想和更恶劣的专制文化代替了,除保留一点痕迹外,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中。是恢复我们记忆的时候了!是从西方的文化中学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时候了!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来到中国大地时,中国文化的特色不会消失,而将如苏秉琦所说的那样,仍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区系,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则如费孝通所讲,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时中国文化方显出勃勃生机。

是以为序。

张忠培

12-4-22 成书于小石岭

## 前 言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延续未曾间断的历史名城,有着数十万年的人类居住历史,3 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年的建都史。漫长的发展岁月中这里积淀了极为广博深远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北京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文物遗迹,是数千年来北京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今天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物证,而这些历史的印迹只有一部分见于文献典籍,绝大部分则尘封于地下,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去再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成绩卓然,展示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构建和诠释北京地区社会发展历史与城市变迁历史方面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如果从1927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算起,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基本建立了北京地区史前考古的文化序列。周口店遗址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及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证实5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其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继续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外,还新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遗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对推进北京地区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演进历程的探讨具有重要作用。据统计,北京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约48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墓葬和零散遗存点约4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在北京城区和多个郊区,共同构建了北京地区史前历史发展的脉络,为认识北京地区史前文化结构和研究不同史前文化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内容丰富,在反映北京文化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地区三代考古的重大贡献是为西周初年封立“燕”、“蓟”二国及“燕”、“蓟”古城的探讨提供了实物资料。琉璃河遗址发现的燕都古城以及大量西周时期墓葬、车马坑和带有燕侯铭文的众多青铜礼器,印证了文献所载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和封召公于燕是信史,同时也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匮乏及不确定性,笼罩在北京古都城市历史起源上的迷雾正在廓清,“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愿望正在实现。而“玉皇庙文化”的发现则表明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北京地区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即位于北京南部的燕文化和位于北部燕山山地间的“玉皇庙文化”。“玉皇庙文化”的发现独立地回答了文献资料所无法回答的历史问题,进一步展现了通

过考古学构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历史的可能。

北京地区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也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北京史的认识。北京地区秦汉古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研究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和北京地区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资料。北京地区城市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开展,基本究明了北京名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系列。古蓟城、西晋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等城市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为研究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和城市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史料,考古调查与研究获的有关城池、建筑、街巷道路、宫殿苑囿、手工业生产作坊、城市的河湖水系等的各种实物资料丰富了北京史研究的内容。

金代皇陵、明定陵、清代园寝等帝王陵墓考古所取得的诸多重要成果,使人们对陵园分布、陵园布局、陵寝建筑、陵邑形制等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对于研究陵寝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汉代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般墓葬的发掘,数量更是惊人。大量墓葬的清理及相关的墓葬考古研究,丰富了相关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资料,促进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起到了考古补史、证史的作用。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以实物资料串联起了北京历史发展的链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北京城市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北京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北京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

北京考古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是北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及时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北京考古工作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能在回顾与前瞻、反思与总结中不断明确北京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希冀对北京考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促进北京考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本书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并拥有全部著作权。宋大川作为主编,做了策划、组织和审稿工作;夏连保作为副主编,协调了本书的编写事务;史前卷由郭京宁著,夏商周卷由张智勇著,东周卷由王继红著,汉代卷由胡传耸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董坤玉著,辽代卷由于璞著,金代卷由丁利娜著,元代卷由孙勔著,明代卷由李永强著,清代卷(上)由朱志刚著、清代卷(下)由张中华著。

本书史前卷由吴加安先生审稿,夏商周卷由赵福生先生审稿,东周卷由靳枫毅先生审稿,汉代卷由信立祥先生审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乔梁先生审稿,辽代卷由齐心先生审稿,金代卷由陈平先生审稿,元代卷由魏坚先生审稿,明代卷由荣大为先生审稿,清代卷由李建平先生审稿。

特别要感谢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先生奖掖后学,欣然为本书作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先生大义,吾侪铭刻于心。

诚然,《北京考古史》的编写只是个初步的尝试,不足之处很多,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我们真诚地希望抛出这块粗砖,引来众多有识之士的美玉,从而快速推进北京考古研究的发展。

宋大川

二零一二年五月

# 目 录

|                            |           |
|----------------------------|-----------|
| 序·····                     | 张忠培 ( 1 ) |
| 前 言·····                   | 宋大川 ( 1 ) |
| 第一章 概论·····                | ( 1 )     |
| 第二章 夏商时期考古发现·····          | ( 10 )    |
| 第一节 早期遗存·····              | ( 10 )    |
| 第二节 刘家河墓葬·····             | ( 14 )    |
| 第三节 张营遗址·····              | ( 25 )    |
| 第四节 龙坡遗址·····              | ( 40 )    |
| 第五节 塔照遗址·····              | ( 42 )    |
| 第三章 西周时期考古发现·····          | ( 49 )    |
| 第一节 镇江营遗址·····             | ( 49 )    |
| 第二节 琉璃河遗址·····             | ( 61 )    |
| 第三节 牛栏山墓葬·····             | ( 109 )   |
| 第四节 白浮村墓葬·····             | ( 111 )   |
| 第四章 北京夏商西周时期文化格局与发展阶段····· | ( 116 )   |
| 第一节 文化类型与谱系·····           | ( 116 )   |
| 第二节 年代与分期·····             | ( 123 )   |
| 第三节 经济形态·····              | ( 124 )   |
| 第四节 文化发展阶段·····            | ( 126 )   |

## 插图目录

|                         |        |
|-------------------------|--------|
| 图一 北京地区夏商西周遗址分布图·····   | ( 8 )  |
| 图二 刘李店M1平面图及出土陶器组合····· | ( 11 ) |
| 图三 刘家河墓葬陶器·····         | ( 12 ) |
| 图四 刘李店78H1陶器·····       | ( 13 ) |
| 图五 凤凰山墓葬陶器·····         | ( 13 ) |
| 图六 刘家河墓葬平面图·····        | ( 14 ) |
| 图七 刘家河墓葬金属器·····        | ( 15 ) |
| 图八 张营遗址夏商时期遗迹分布平面图····· | ( 26 ) |
| 图九 张营遗址部分遗迹·····        | ( 26 ) |
| 图一〇 张营F1平、剖面图·····      | ( 27 ) |
| 图一一 张营遗址陶器·····         | ( 27 ) |
| 图一二 张营F2平、剖面图·····      | ( 28 ) |
| 图一三 张营Y1平、剖面图·····      | ( 28 ) |
| 图一四 张营遗址灶址·····         | ( 29 ) |
| 图一五 张营遗址灰坑·····         | ( 30 ) |
| 图一六 张营H18陶器组合·····      | ( 30 ) |
| 图一七 张营H58陶器组合·····      | ( 30 ) |
| 图一八 张营M6平、剖面图·····      | ( 31 ) |
| 图一九 张营M6陶器组合·····       | ( 31 ) |
| 图二〇 张营W3平、剖面图·····      | ( 31 ) |
| 图二一 张营W3陶器组合·····       | ( 31 ) |

|     |                                  |        |
|-----|----------------------------------|--------|
| 图二二 | 张营遗址陶器·····                      | ( 32 ) |
| 图二三 | 张营遗址陶器·····                      | ( 33 ) |
| 图二四 | 张营遗址陶器·····                      | ( 33 ) |
| 图二五 | 张营遗址石器·····                      | ( 34 ) |
| 图二六 | 张营遗址铜器·····                      | ( 35 ) |
| 图二七 | 张营遗址玉、骨器 ·····                   | ( 36 ) |
| 图二八 | 张营遗址典型器物组合图·····                 | ( 37 ) |
| 图二九 | 龙坡遗址遗迹·····                      | ( 40 ) |
| 图三〇 | 龙坡遗址器物·····                      | ( 41 ) |
| 图三一 | 商周一期灰坑·····                      | ( 42 ) |
| 图三二 | 塔照M6平、剖面图 ·····                  | ( 43 ) |
| 图三三 | 塔照M14平、剖面图 ·····                 | ( 43 ) |
| 图三四 | 折肩陶鬲、陶豆 ·····                    | ( 44 ) |
| 图三五 | 塔照遗址第一期陶器·····                   | ( 44 ) |
| 图三六 | 商周二期灰坑·····                      | ( 46 ) |
| 图三七 | 陶鬲、陶瓮 ·····                      | ( 47 ) |
| 图三八 | 塔照遗址第二期陶器·····                   | ( 48 ) |
| 图三九 | 镇江营F8平、剖面图 ·····                 | ( 50 ) |
| 图四〇 | 商周三期灰坑·····                      | ( 51 ) |
| 图四一 | 镇江营M2平、剖面图 ·····                 | ( 52 ) |
| 图四二 | 商周第三期遗存器物·····                   | ( 52 ) |
| 图四三 | 镇江营遗址第三期陶器·····                  | ( 54 ) |
| 图四四 | 镇江营F2平、剖面图 ·····                 | ( 56 ) |
| 图四五 | 商周四期灰坑·····                      | ( 57 ) |
| 图四六 | 镇江营遗址第四期陶器·····                  | ( 58 ) |
| 图四七 | 骨梭、卜骨 ·····                      | ( 59 ) |
| 图四八 |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                   | ( 62 ) |
| 图四九 | 琉璃河遗址发掘现场·····                   | ( 64 ) |
| 图五〇 | 排水沟·····                         | ( 64 ) |
| 图五一 | 陶水管·····                         | ( 64 ) |
| 图五二 | 琉璃河居址陶器·····                     | ( 65 ) |
| 图五三 | 琉璃河居址灰坑·····                     | ( 67 ) |
| 图五四 | 刻字卜甲·····                        | ( 68 ) |
| 图五五 |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区墓葬分布图(编号者为已发掘墓葬) ····· | ( 69 ) |
| 图五六 | 琉璃河M202平、剖面图 ·····               | ( 70 ) |

|     |                     |         |
|-----|---------------------|---------|
| 图五七 | 琉璃河M202CH平面图        | ( 71 )  |
| 图五八 | 琉璃河M52平面图           | ( 72 )  |
| 图五九 | 琉璃河M52CH1平、剖面图      | ( 73 )  |
| 图六〇 | 琉璃河M251部分器物出土状况     | ( 73 )  |
| 图六一 | 琉璃河M4平、剖面图          | ( 74 )  |
| 图六二 | 琉璃河墓葬一期陶器           | ( 74 )  |
| 图六三 | 琉璃河西周墓地主要陶器演变图      | ( 75 )  |
| 图六四 | 琉璃河墓地青铜礼器           | ( 76 )  |
| 图六五 | 琉璃河墓地青铜兵器           | ( 76 )  |
| 图六六 | 琉璃河墓地青铜车马器          | ( 77 )  |
| 图六七 | 琉璃河墓地青铜礼器           | ( 77 )  |
| 图六八 | 琉璃河墓地原始青瓷器          | ( 78 )  |
| 图六九 | 琉璃河墓地装饰品            | ( 79 )  |
| 图七〇 | 琉璃河M1022平面图         | ( 80 )  |
| 图七一 | 琉璃河M1029平面图         | ( 80 )  |
| 图七二 | 琉璃河M1046平、剖面图       | ( 81 )  |
| 图七三 | 琉璃河M1046墓道及1100号车马坑 | ( 81 )  |
| 图七四 | 琉璃河M1193平面图         | ( 82 )  |
| 图七五 | 琉璃河M1193青铜器         | ( 82 )  |
| 图七六 | 琉璃河墓地青铜礼器           | ( 83 )  |
| 图七七 | 琉璃河95F15M2平面图       | ( 85 )  |
| 图七八 | 琉璃河M4平面图            | ( 86 )  |
| 图七九 | 琉璃河M5发掘状况           | ( 86 )  |
| 图八〇 | 琉璃河墓地陶器             | ( 87 )  |
| 图八一 | 琉璃河墓地青铜礼器           | ( 87 )  |
| 图八二 | 牛栏山墓葬“亚其”铭青铜礼器      | ( 110 ) |
| 图八三 | 牛栏山墓葬铜器             | ( 110 ) |
| 图八四 | 白浮M2平、剖面图           | ( 112 ) |
| 图八五 | 白浮墓葬出土器物            | ( 113 ) |
| 图八六 | 白浮墓葬青铜短剑            | ( 114 ) |

## 插 表 目 录

|                      |     |
|----------------------|-----|
| 附表 北京夏商西周考古零散发现····· | (9) |
|----------------------|-----|

## 第一章 概 论

本书所讲的时间范围主要是夏至西周这一历史阶段,即通常所指的三代。具体而言,即夏始纪年的公元前21世纪初<sup>[1]</sup>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前。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北京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即历史上的夏、商两代。从简略的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北京及周围地区生活着多个部族,创造了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

周武王灭商后,采用“封邦建国”、“以藩屏周”的统治政策,为巩固西周王朝东北边疆,分封周王室同姓贵族召公于北燕,即今天的北京及周围地区。关于周初封燕,《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sup>[2]</sup>《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于是封功臣谋士……封召公奭于燕。”<sup>[3]</sup>《汉书·地理志》载:“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sup>[4]</sup>这些史料记载了当时召公受封的情况。而从发掘的琉璃河1193号墓中出土的铜罍、铜盃铭文记载可知,由于召公留守宗周辅佐王室,故由其长子“克”到燕地就封,为事实上的第一代燕侯。另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sup>[5]</sup>可知,自燕初召公始封后至共和行政二百年间,燕国历史文献无载,因而借助于考古发掘积累的资料来了解西周燕国这一时期的历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夏商西周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此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取得了重大突破。具体表现在通过科学发掘所获得的考古信息不断增多、考古学文化的确立、年代谱系的日趋完善、聚落考古的初步探讨等。这些成果为研究夏商西周时期北京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根据田野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脉络,北京夏商西周时期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目前对于夏代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暂定为公元前2070年,但学术界仍有争议。

[2]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

[3]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

[4]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59年。

[5]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

## 第一阶段 初始阶段

时间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时期是夏商西周时期遗存零星发现及对材料的初步认识阶段。

本阶段的夏商西周时期考古以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发现最早。1945年吴良才先生在琉璃河遗址采集到散落的陶片标本,该遗址始为考古界所知<sup>[1]</sup>。1958年北京市文物大普查中发现琉璃河遗址的迹象<sup>[2]</sup>。1959年在全国性的文物普查中,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发现了镇江营遗址,当时确定属商周时代遗址<sup>[3]</sup>。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了昌平雪山遗址,这次发掘揭示出一、二、三期遗存的早晚地层关系,将该遗址晚于龙山时代的遗存称为“雪山三期文化”,初步确立了北京地区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sup>[4]</sup>。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发现并试掘了琉璃河商周时期遗址<sup>[5]</sup>。1964年在琉璃河黄土坡村发现了“叔乍宝尊彝鼎”和“父癸爵”,为了解琉璃河遗址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sup>[6]</sup>。

本阶段因考古发现较少,发掘工作有限,资料较为零散,尚无法为研究工作提供基本资料,对遗存文化性质与相对年代的判定只能是粗线条的,虽然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和试掘带动了关于燕国始封地问题的探讨,但总体而言,研究工作仍较薄弱,故称之为初始阶段。

## 第二阶段 发展阶段

时间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是资料逐渐增多及依据对资料的系统整理得出一定认识的阶段。

从70年代初开始,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房山县文教局等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勘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发现了墓葬、房基、窖穴、灰坑等遗迹。其中1973~1977年对燕国墓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清理西周时期墓葬61座,车马坑5座<sup>[7]</sup>;同时对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sup>[8]</sup>。其他

[1] 殷玮璋:《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致辞发言》,《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2] 北京市文物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近年来的北京文物工作》,《文物》1959年9期。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 《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四年级在京郊实习——发掘到新石器时代至辽代文化遗址》,《光明日报》1964年4月2日。

[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3期。郭仁:《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记》,《文物天地》1992年4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田敬东:《琉璃河遗址发掘述略》,《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齐心:《琉璃河商周遗址发现、发掘与研究》,《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房山县文教局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1期。

重要工作,包括1973年房山琉璃河墓葬<sup>[1]</sup>、1975年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sup>[2]</sup>、1977年平谷刘家河商墓<sup>[3]</sup>、1978年平谷刘家河陶器墓和灰坑<sup>[4]</sup>、1982年顺义牛栏山墓葬<sup>[5]</sup>、1984年密云凤凰山墓葬的发现<sup>[6]</sup>。

在对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燕山南麓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相关的研究中,各类遗存的文化属性及年代判定引发研究者的讨论,基本上经历了从最初将其视作夏家店下层文化,到提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地方类型,进而到能够区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过程。李经汉先生把燕南地区夏商遗存与辽西、燕北同时期遗存进行了比较,将京津唐地区的夏商时期遗存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认为其与燕北类型的差别主要在于地域的不同<sup>[7]</sup>。邹衡先生分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延续时间,注意到其分布范围内文化的地区性差异,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成“辽西型”与“燕山型”,并从房址、墓葬、石器、陶器、铜器等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sup>[8]</sup>。韩嘉谷先生对燕山南麓商周时期遗存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进行了比较,将京津地区商周时期遗存分为大坨头类型、围坊上层类型和张家园上层类型,指出这是京津地区土著文化连续发展的三个类型,其中较早的大坨头类型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属不同的考古文化圈<sup>[9]</sup>。

自然科学应用方面,197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碳<sup>14</sup>实验室对昌平白浮西周墓的木椁进行液体闪烁法碳<sup>14</sup>年代测定<sup>[10]</sup>。对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铁刃铜钺采用中子活化法、电子探针法、X荧光光谱法等检测分析,从含钴和镍元素确定为陨铁而不是铸铁<sup>[11]</sup>。北京钢铁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对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进行检测,不仅对其木炭取样进行碳<sup>14</sup>分析,而且对部分青铜器进行了检测<sup>[12]</sup>。

这一时期之所以称为发展阶段,主要标志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 考古发现数量增多,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逐渐展开,资料的发表和积累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2. 一些重要课题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有关夏商时期遗存分类、文化属性、年代分期等问题的认识与研究逐渐深入。
3. 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并取得初步成果,体现了自然科学与考古学结合的作用。

[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房山县文教局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1期。

[2]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4期。

[3]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

[4]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5] 程长新:《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铜器》,《文物》1983年11期。

[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7] 李经汉:《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8]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9] 韩嘉谷:《京津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的一点线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sup>14</sup>实验室:《液体闪烁法碳<sup>14</sup>年代测定工作初步报告》,《文物》1976年12期。

[11] 齐心:《北京地区考古工作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取得初步成果》,《北方考古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 齐心:《北京地区考古工作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取得初步成果》,《北方考古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 第三阶段 繁荣阶段

时间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这一时期是北京夏商西周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阶段。

1986年对拒马河流域开展的考古调查,摸清了汉代以前文化遗址的基本状况,是迄今为止在北京地区进行的最为深入、最有价值的考古调查<sup>[1]</sup>。1986~199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连续5年对镇江营遗址和塔照遗址进行了发掘。根据地层关系和文化比较,共发现分属新石器时期和夏商周时期的九种文化。其中夏商西周时期有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西周燕文化四种<sup>[2]</sup>。张营遗址于1984年北京市进行第二次文物大普查时被发现,1989年、2004年两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sup>[3]</sup>。

本阶段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从1984年至2002年止,清理了墓葬、城址、居址、祭祀坑等遗迹。其中1981~1986年共发掘大、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200余座<sup>[4]</sup>,尤以1986年发掘的1193号大墓最为重要,出土了带有43字铭文的铜罍、铜盃,对深入研究琉璃河遗址性质和燕文化具有关键的作用和极其重要的意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sup>[5]</sup>。1995年试掘了古城东城墙北部,发现城墙和排水沟<sup>[6]</sup>。1996年发掘发现了北城墙和护城河<sup>[7]</sup>。2001年发掘清理西周中晚期墓葬3座<sup>[8]</sup>。2002年发掘西周时期墓葬12座<sup>[9]</sup>。

关于考古学文化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从能够区分进而命名为独立考古学文化到相关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张忠培等先生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成了西辽河水系区和海河北系区两大类型,同时将围坊与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存统称为“张家园(围坊)上层文化,认为它是商代在海河北系区取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种新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sup>[10]</sup>。郭大顺先生认为燕山南北地区属一种文化,燕山以北地区年代偏早,燕山以南地区出现稍晚,其文化中心有由北向南发展的趋势<sup>[11]</sup>。李伯谦先生采纳了上述观点,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屋、墓葬、生活用陶器等特征进行了探讨,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分为“药王庙(燕北)、大坨头(燕南)、壶流河(壶流河流域)”三个类型,并将大坨头类型分为五段<sup>[12]</sup>,这在当时是关于京津唐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比较详细的分期。韩嘉谷先生检讨了此前提出的“大坨头类型、围坊上层类型、张家园上层类型”认识的

[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9年3期。

[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6]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

[7] 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6期。

[8] 楼朋林:《琉璃河遗址2001年度西周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遗址新发掘的西周墓葬》,《200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3年。

[10] 张忠培、孔哲生、张文军、陈雍:《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11] 郭大顺:《丰下遗址陶器分期再认识》,《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2] 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